



孙官生

云南人民出版社

K285.4

4
2

B032107

古老·神奇·博大

——哈尼族文化探源

孙官生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承墉
封面设计：李泽衡

古老·神奇·博大——哈尼族文化探源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5 字数：230,000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222-00784-9/G·71 定价：5.05 元

前 言

在中国 54 个民族之中，人口上百万的民族不到三分之一。哈尼族占了其中的一个席位，是一个大的民族。人口 106 万。遗憾的是，它至今还不为外部世界所熟知，它的文化笼罩着一片神奇的雾。

哈尼族有支系（自称或他称）二十余种，为哈尼、叶车、百宏、阿卡、卡堕、白那、期弟、腊咪、阿乌、阿梭、各作、格和、罗美、独气、碧约、西摩洛、梭尼、豪尼、阿松、娥怒、罗毕、哈欧、哈备、喇鲁、糯比等。明清前的历史文献中多称为和泥、倭泥、窝泥。居住在自大理巍山发源、流入越南的红河流域，这一带地处哀牢山、无量山、六诏山区域，高山重叠，河流纵横，阻隔着它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历代中央朝廷对这一地区采取的羁縻政策和实行的土司制度，自然地理的封闭又加上人文的封锁，使哈尼族聚居地区自古以来一直处于一个封闭王国之中。

作者在这一地区作了长期考察，收集了上百万字的第一手资料。深切地感受到了哈尼族同胞的勤劳与智慧，他们在几乎很少得到外部世界信息和支援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灿烂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作出了贡献；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开发了祖国的南部边疆，捍卫了祖国的统一和完整。为了使外部世界认识哈尼族，了解哈尼文化，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对哈尼文化进行了探索。书中试图阐明以下主要观点：

——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生发展是多元的，红河流域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以哈尼族为主体的红河流域居民，是云南土著，不是从青藏高原迁徙而来的。

——哈尼人在数万年以来的实践中，以生存发展为主题，创造了独特神奇的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有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生活习俗；有自己的历史、文化、艺术、美学等等。它们是在红河流域这片神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参天大树，不是其他文化的移植或“尾巴”，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个性，整个发展过程也是独立的。

——说唱艺术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巨大社会功能。它是人类最早的文学样式，早于诗产生，并一直独立发展着。

——哈尼文化同日本传统文化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两个文化体系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哈尼文化是否幅射到了日本列岛？哈尼文化是否就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根”？这尚不能论定，但它已引起了我们“破译”这个“谜”的极大兴趣。

——哈尼族长期处于一个近似全封闭的系统之中，它的基本特征是内部形成了若干封闭的子系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简单复制，缺少足够的同外部世界的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换，因而很难形成带根本性的变革发展。生产力水平长期处于停滞和缓慢发展的状态。尽管红河流域属于地球上优良的生物圈之一，是人类的摇篮之一，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并不落后，但社会发展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远不够的。封闭的结果，使它在许多主要方面落后了二千多年。

哈尼文化由于处于封闭环境之中，故较完整地保存了古

代文化的面貌、气质和特征，几乎可以称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活化石。而且在今天的社会生活的若干方面，仍然在发挥着作用。然而，建国 40 多年来，在国家的关心和帮助下，红河流域的封闭状况在逐渐打破，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日益深入人心，哈尼族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 and 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这一地区还将迈出更大的前进的步伐。认识过去，认识今天现实生活中还大量存在着的原始遗存，是从实际出发，加快哈尼族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改革开放步伐的重要条件。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哈尼文化”的概念，指的是建国以前便形成的传统的、自然形态（或称原始形态）的哈尼文化。只是由于封闭的原因和其他原因，它们在不少哈尼族地区还程度不同地活着。

目 录

红河流域的土著居民

红河流域是早期人类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 (1)

哈尼族——云南红河流域的土著居民 …… (20)

哈尼文化的发生与发展

哈尼文化发展的三个时期 …… (56)

说唱艺术——人类最早的文学样式…… (111)

哈尼族名字初探…… (153)

哈尼族原始宗教

祭龙…… (171)

丧葬祭祀——莫撮撮…… (195)

生殖怪圈与人口爆炸…… (213)

哈尼族饮食文化在祭祀活动中的糜费现象…… (238)

哈尼美学观与心理素质

以人的生存发展为中心的美学观…… (250)

哈尼族热点问题与民族心理素质…… (273)

哈尼文化的辐射

与日本文化相似之谜…… (284)

封闭对于哈尼文化的教训

红河南岸封闭系统及其历史教训…… (335)

红河流域的土著居民

红河流域是早期人类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

多年来人们在探索这样一个问题：以哈尼族为主体居民的红河两岸远古时代是否是荒无人烟的土地，是迁徙者发现的“新大陆”？很久以来，在学术界普遍流行“南迁说”——红河两岸少数民族的先民，是从云南以外很远的北方迁徙来的。对此，本人是不敢苟同的。近年来考古发掘的大量材料，今天仍“活”在这一地区少数民族中的证据，甚至“南迁说”漏洞百出的本身都说明，红河两岸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今天红河两岸哈尼族、彝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自古以来就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创造了独特的、灿烂的“红河文化”。

关于“南迁说”，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概括起来主要有青藏高原说，大渡河畔说，南京说。

(1) 青藏高原说。

哈尼族的族源问题说法不一。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史的学者们大多认为，哈尼族与彝族、拉祜族等，同源于古代的羌族。据汉文古籍记载，氏羌族群原游牧于青藏高原，后逐渐向南迁徙。羌的一支在南迁中渡过金沙江，一部份来到了云南的滇池地域，被称为“叟”。“叟”是“尼苏”和“纳苏”的译音，就是今天彝族的祖先。公元前二至三世纪，一部份来到滇西以南的泸江流域，被称为“和”。“和”与“和泥”是对后来哈尼族的总称，也就是今天哈尼族的祖先。①

(2) 四川大渡河畔说，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
在那遥远的北方，
有一条叫诺马的河流，
岸畔是哈尼最先生长的地方。”②

……

这首“史诗”提到了“诺马（又称为“诺马阿美”）的河流”，说这里是哈尼族的发源地。这是哪里呢？编者的注释明确规定，这是“四川大渡河一带”。

(3) 南京说。

“相传我们哈尼族的阿柏（即祖先——引者），居住在现今南京一带的时候，普天之下都还没有五谷杂粮，世间上的人们都还不会开田种地。”③笔者在红河县甲寅乡调查时，哈尼族老人钱志高也认为，他家祖籍在南京，“远古时候”从南京搬至石屏，后来才来到红河甲寅的。

上述三种说法尽管在地理位置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下面两点上却是一致的：第一，红河两岸少数民族的族源在云南以外的北方，他们不是这儿的土著居民。第二，红河两岸在远古时代是没有人类活动的荒野，只是当北方的人类迁徙来到这里以后，才繁衍出今天红河两岸的少数民族。由此派生出来的一个结论是：人类的发祥地在北方。

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红河两岸考古发现和文物普查的初步成果，对红河两岸少数民族的族源问题作了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回答。

红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全长一千二百公里，自西北向东南入海。红河地处哀牢山山脉，南北形成南盘江、藤条

江、泸江、勐拉河等大小数十条支流。山峦连绵，沟壑交错，既有高山峡谷，又有丘陵湖泊和数十个高原平坝。古代的红河据地质考察和《开化府志》等文献记载，流量大，水面宽，舟楫交通较为方便。古代的红河两岸属热带亚热带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是适宜人类生长活动的地方。恩格斯指出：在蒙昧时代低级阶段，即人类的童年时期，“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或亚热带的森林中。”^④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贾兰坡，也主张人类起源的中心是亚洲南部。红河两岸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正如为考古发现所证实的那样，是早期人类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

(1) 腊玛古猿化石。

一九五六年，在开远小龙潭露天煤场，发现腊玛古猿化石（最初定为森林古猿化石），这是在我国首次发现的腊玛古猿化石。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二年，又在同一个区域相继发现腊玛古猿的三枚下牙和带十一枚牙齿的较为完好的上颌骨。腊玛古猿化石最早于一九一〇年发现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的西瓦立克山区。一九六一年以后，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西蒙斯以及皮尔彼姆经过考证，认为腊玛古猿同森林古猿比较，在形态上更为进步，应属于人科早期的种类。腊玛古猿脸部较短，上下犬齿较小，犬列弯曲成弓状，吻部远为短缩，没有发现肢骨，说明腊玛古猿已能初步用两足直立行走。是从猿进化到人类的代表，即恩格斯所说“正在形成中的人”。

开远腊玛古猿生活在一千五百万年前。与腊玛古猿化石同时发现的动物化石有：轭齿象、嵌齿象、四棱象、古獾、河狸、小河猪、利齿猪、鹿、巨额嵌齿象、河马等十余种。

从腊玛古猿化石及其伴生的动物化石的性质来看，可以推知他们生存时代的环境——炎热的热带气候，茂密的原始森林，其间或是丘陵盆地，或是河流峡谷，或是林间草地，或是沼泽湖泊。正是这样的优越环境满足了腊玛古猿草食和部份肉食之需，以及生存繁衍的种种便利。开远小龙潭在一千五百万年前正是典型的热带森林沼泽地带。类似上述腊玛古猿生活的理想环境，在红河两岸的广大地区比比皆是。在从猿到人逐渐演化的过程中，时间至少在一千万年以上。在寻找这一漫长时期的人类遗迹方面，正象开远腊玛古猿所显示的那样，红河两岸是很有希望的、得天独厚的地区。

(2) 分布广泛的石器。

红河两岸的腊玛古猿，由正在形成中的人，经过劳动，转变为人，由原始群时期发展到原始公社时期。在漫长的劳动中，由使用天然工具发展到制造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⑤ 这里所说的制造工具，指的是制造石器，即旧石器和新石器。

一九八二年以来，红河两岸先后发现旧石器和新石器，尤其新石器遍布两岸广大地区。早在一九八〇年，文物工作者便在河口县桥头孤山洞堆积物中发现东方剑齿象化石，这是距今三万多年的古生物化石，根据这个线索，文物工作者于一九八二年在原址进一步考察，终于发现两件旧石器。据鉴定，均为用闪长岩砾石打制而成的，一件为刮削器，一件为兼有刮削和砍砸功能的石器。同时还发现伴生的犀牛、

鹿、鼠等哺乳类化石。一九八九年，又在蒙自马鹿洞发现一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和大量旧石器。

新石器迄今发现二十九件，分布在南岸的红河、金平、元阳及北岸的河口、建水、屏边、个旧等县（市）。有石拍子（1件）、石铤（10件），有肩石铤（6件）、石斧（6件），有肩石斧（4件）、石凿（2件）。这些器物，大多采用质地坚硬的卵石片磨制而成，它同北方出土的新石器比较，有自己显著的特点。红河两岸的新石器是用这一带的石料加工制作的，几乎全部为斜刃梯形；器形普遍稍宽，而且多为有肩器，颇有些类似今天的锄头呢！这就形成了独特的红河风格。北方的新石器以西部的仰韶石器为例，器形主要为斧、铲、刀等，石斧普遍为扁圆刃，横剖面为椭圆形；石铲呈心形或舌形；刀为长方形，两端打两个缺口，也有长方形磨光穿孔的。此外还有石棒、石磨盘等。很少有有肩的斧、刀、铲。足见红河两岸的新石器不是从北方流传来的。

(3) 陶器。

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氏族社会的陶器也有多起发现。例如，在河口县坝洒不但发现了新石器，还发现红、黑陶片。在个旧市贾沙区阿邦村，红河县阿底坡山麓均发现大量陶片，以及较完整的敞口陶罐。质地为砂土，胎较薄，器形多为罐。这也具有红河文化自己的特点。有意思的是，在红河南岸至今还保留着原始社会的陶器制作工艺。笔者一九八五年三月曾和红河州文管所的同志一起，对红河南岸元阳县那里村的原始制陶工艺进行了实地考察。人们先到村后三五十米的山坡上挖来红砂土，捣碎、筛后以水和泥，做成泥条，置于一个木垫上，以手捏制，快成型时，辅以拍板、锯

镰、印花板、布条、小竹片、小竹筒等工具，最后做成印纹陶罐，在阴凉通风处风干之后，任意置于空地之上，用干稻草埋上，点燃稻草烧半小时左右即成。一次一般烧十个左右，用两背稻草就可以对付了。全村二十余户，每户的妇女都会做，一人一天可做五、六个陶罐。那里村的制陶工艺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大多以手制为主，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绝大多数是手制的，其中小型器物直接用手捏制，大多数是用泥条圈叠筑法和泥条盘筑法，只有极少数陶器经慢轮修整。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金石并用时代，轮制陶器就大量出现了。⑧那里村的制陶没有轮盘，也没有窑子烧，这比仰韶文化遗址的半坡、兰州白道沟坪马家窑的制陶工艺还要古老，也比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保留的原始制陶工艺——慢轮泥条盘筑、平地封泥烧制的时间更早、更原始。

(4) 金石并用。

金石并用时期是人类文化由石器文化过渡到青铜器文化所经历的一个漫长而必经的阶段。人类大约在四千年前进入金石并用时期，出现了铜器，由于铜器的使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显示出了优越性，但为数甚少，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完全代替石器，这就出现了金石并用的局面。红河两岸的先民们也同样经历了这个文化过程。笔者一九八五年三月同云南省博物馆、红河州文管所的同志一起在红河岸边的阿邦村清理古墓葬时，找到一具完整的石化程度较深的人体骨骼及大量头骨、牙齿和肢骨。在现场收集到许多石制串珠和陶片。并且在那具人体骨骼化石的小腹部，发现了一件青铜器和一件石器，青铜器为铜斧，石器是一块巴掌大呈椭圆形、

中间打磨下凹的石块。两件规整的排列着。另据农民反映，以前在此地修电站时，民工不但拣到过石器，也拣到过一件青铜器。这可能是金石并用时期的遗物。

(5) 青铜器。

红河两岸，除个别地区外，各市县均发现了青铜器，种类有斧、锄、犁、矛、钺、凿以及铜鼓等。笔者一九八五年八月同红河州文管所的同志到阿底坡考察，这里是小河底河与红河的交汇处，又是红河县、元江县、石屏县的交界处，地势险峻，战略地位重要。远古时代必然是通往各大部落的交通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这一带过去就曾有发现青铜器的报道，这一次在建桥施工中，又在五十平方米左右紧靠江边的斜坡地上，在表土下约两米左右的深处，发现许多人骨化石（有一定石化程度），拣到铜矛等青铜兵器一百余件，有的铜矛上还铸有小铜虎。据电站民工讲，他们还挖到一个头骨化石，上面还穿着铜矛头，此处还有铜灯盏，铜勺等，因不懂得它们的意义，丢到江里去了。

红河两岸出土的青铜器，造型基本一致，扁平、刃宽呈弧形，釜深而且宽大。从造型上看，与这一地区出土的新石器的形状基本一致，可以这样认为，这是土著民族在新石器器物造型的基础上铸造而成的，有它的独特之处和地区特点。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⑨红河两岸产铜、锡、银、铅等矿，个旧、金平、弥勒等市县均发现有色金属的古采炼遗址。《汉书·地理志》：“贲古北采山产铜、锡。南乌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指的就是红河两岸地区，汉时已有相当规模，小量的开采、冶炼当然就更早了。

(6) 彝族岩画。

一九八五年，红河州文物工作者在红河北岸，南盘江流域的勒弥县巡检司独家村附近发现一幅长14米、宽2米的岩画。画左边和左下部，用彝族文字写着“舞天”、“炎热三月到此一游”的字样，画面是若干组舞蹈、杂耍、祭祀的场面，最顶部画有九个太阳，其中一个放射光芒，八个是象征性的。这幅画的主题当是这一带的彝族部落群众在节日欢庆丰收，祈祷幸福，载歌载舞，欢腾跳跃。这幅画的时限比青铜文化稍晚，大约为隋唐时期，因为已经形成了彝族的部族，有了古文字（画上有的彝族文字在明清以来的彝文书中已经失传）。

从以上六个方面的简要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腊玛古猿正在形成中的人演变到原始群，再过渡到原始氏族社会，再发展到红河地区少数民族的部落、部族和支系。这一“红河文化”的轨迹是不间断的，它既具有人类发生发展的一般特征，又具有鲜明的红河特点。这是以地下出土实物为佐证的红河两岸少数民族先民的历史，是同传说故事有本质区别的无可怀疑的历史。在这以后（即隋唐以后），已经可以从汉族历史文献中找到佐证，唐张九龄《曲江集》：“敕安南首领归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僚子首领阿迪、和蛮大鬼主孟谷……卿等虽在僻远，各有部落，俱属国家，并识王化”。说明此时哈尼、傣等族在红河两岸已强大起来，形成了有影响的部落。至于彝族先民部落的记载，《汉书》、《蛮书》等历史典籍中有更多的记述。这样，“红河文化”的轨迹一直联到今天。

从对红河两岸少数民族形成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南迁说”是站不住脚的。下面对“南迁说”的各

种观点加以剖析：

(1) 关于“青藏高原说”。

让我们分析一下羌族的演变历史。羌族在公元二至三世纪属西戎族的一支。当时，在广阔的北方，分布着许多部落，《尧典》歌颂尧“光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讲尧能团结本部落的民众（九族），还能团结周围众多部落（万邦）。在这个时期，根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提示，中原以及周围的民族分布是这样的：居住在西方的称戎族，北方的称狄族，东方的称夷族，南方的称蛮族，中原一带的称黄帝族。这里所说的东西南北四方，是针对中原而言，就分布在中原周围，北方不过山西一带，西方不过甘肃、青海、四川一带，南方不过长江流域，东方不过山东一带。羌作为戎族的一支，住在比较靠近中原的陕西、青海、甘肃、四川一带。西周以前，羌族的一个酋长炎帝（姓姜，即羌）进入中原地区，与九黎族发生冲突，得到黄帝的支援，打败九黎族，黄帝、炎帝又联合打败南蛮的首领蚩尤。后来黄帝族又击败炎帝的羌族，于是，黄帝族与炎帝（羌）族在中原地区开始融合和联合，共同对付强大的苗族。《中国通史简编》说：“尧禹时期，存在着以黄帝族为主，以炎帝族、夷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禹武力最大，压迫苗族退向长江流域，黄、炎族占有了中原地区（主要是黄河中游两岸），从这里孕育了后来发展起来的伟大灿烂的华夏文化”。羌尽管是戎的一支，但它的部落很多，人也不少，除主要部份为炎帝带领进入中原，与黄帝族融合之外，原来的甘肃、青海一带还有一部份留居，周、秦、两汉时代多次向中原地区发展，与中原政治、经济、军事交往

很多，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羌——西戎种族，分布甘肃、青海一带，两汉时与汉战争不绝。羌人少种五谷，游牧为业，《后汉书》说羌有一百五十种……祖先名爰剑，曾做秦国的奴隶，学得农业传授族人。^⑩

羌人（西戎的一族）爰剑，秦厉公时（前476—前443）被俘为奴隶，学得农业知识，后来逃回羌地，教人耕种、牧畜，诸羌敬服，推为大酋。原来射猎为生的羌族，从此渐成西方强族，秦文化对更落后的戎人也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到了东汉时，羌族已内附，部份内迁，所余者，在东汉至北宋间建立后秦和西夏国。东汉时曾发生西北地区羌族人民起义，前后经历五、六十年，给东汉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此后羌人便逐渐同西北地区的汉族及其它民族融合。

史料证实，西北地区，中原地区的羌族同包括红河两岸在内的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是无关的。《尚书·牧誓》里曾经谈到，武王伐纣时率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夷出征，取得了胜利。据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考证，“庸、卢、彭、濮，都在今湖北省的西北角，楚的郢都的北面，和河南陕西都近，而和四川云南都远。其他髳、微、蜀都在汉水、渭水流域。羌的大本营在今甘肃南部，看《后汉书·西羌传》便知”。顾先生认为，羌及其他夷人，均和金沙江流域的人无关（《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意思很清楚，西北和中原的羌人就是西北和中原的羌人，他们与西南的少数民族无任何关系，换言之，西南的少数民族并不是他们南迁的分支。